

⑳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6 页。

㉑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导论）。

作者简介：朱士光，男，1939 年生，湖北武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710062。

西安城市生命力的初步解析

侯甬坚

在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尤其是城市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诸多城市如繁星似锦绣，错落分布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历史长，而且持续至今，构成了世界历史上引以为骄傲的东方城市生命史。我们想知道，这些城市生命史为何如此之长，其生命力何在？其生存的奥妙何在？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在哪些方面起作用？我们设想，尽可能地从一个城市的细节入手，就其城址、演变关节、延续和扩展的关键因素等展开连续性思考和研究，将一个个城市作为一个个生命体来看待，以生命力解析生命史，从中揭示出一些带有本质性的东西，就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一种热切追求。

本文以古都西安为例，意欲初步展开揭示其城市生命力的解析工作。工作之初所怀有的一种预设和感受，就是应当采用拟人的方式，在细致描述城市为人类美好居住场所的同时，对其寄予人类精神生活上的无限关怀。

一、西安城市发展史上曾度过的四大难关

西安坐落在黄河支流渭河下游平原中部的南侧，在这一习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宽广土地上，西安小平原上渭河边到秦岭沔峪口的南北距离为 30 公里，西安东南靠近秦岭山脚前向北延伸出去的白鹿原、少陵原、神禾原，形成很可靠的地理依托。历史上周秦汉隋唐诸王朝的都城就先后选建在此。

西安的都城史及城市史都很长，由于早期历史纪年的缺乏，今人只知周文王在晚年建都丰京（沔河西岸），周武王建都镐京（沔河东岸），接续下来的都城有秦之咸阳（跨渭河两岸）、西汉西晋南北

朝之长安（龙首原之北）、隋唐之大兴、长安（龙首原之南）。包含都城史尤其是唐以后连贯的城市史，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西安市，都城史逾千年，城市史超过三千年，这就是西安城市生命史。西安数千年间经历过的磨难，难以备述，只能举其大端，略加申明。

1. 粮食短缺

秦国征伐诸国，多辟草莱，实行“农战政策”，兼修郑国渠，以达富国强兵的目的。西安建都长安，皇帝百官加百姓人口二三十万，还有大量军队，消费极大，粮食吃紧，当地不能满足，主要靠从关东地区不断漕运粮食，如河东守番系所说“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①。隋唐建都大兴及长安城，人口数又多于西汉，遭遇灾荒之年，粮食极为短缺时，还出现过皇帝“就食东都”洛阳的事情。唐中宗李显不愿意做“逐粮天子”、唐德宗李适赶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关西地区自身粮食供应不足的困境^②，断断续续的漕粮西运，支撑到唐末，连同中原王朝其它内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国都就顺势向东迁走了。

2. 巨大战乱

国都所在，既然是全国的要害之地，一旦出现反抗王朝的势力，若控制不住，不断升级，就会出现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秦末、西汉末、隋末、唐末战乱之火烧及都城，立即导致王朝灭亡或走向衰落，就是这样的例子。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的历史长期不显^③，就在于天下动乱不宁，长安城深受其害。至于西汉历时近两百年、唐朝历时接近三百年间，所承受的兵荒马乱甚多，平日里人们多以生活在天子脚下、京畿之地为荣耀，战乱之时民众则迅

即遭受战火涂炭，诸多辉煌的建筑也一道付之一炬。新的王朝建立，系一次次从废墟中再建，为西安都城史的一个特点。

3. 都城迁走

公元904年^④，在唐末战乱中崛起的朱全忠，勒逼唐昭宗李晔及宫人东迁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薨号哭，月余不息”^⑤，从此，封建王朝的都城迁离了长安。罗伯特·萨默斯深谙其中意味，他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因为在唐代及其以前时代里，关中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⑥。后唐对长安还有一些留恋^⑦，但也只是千年帝都的一点余绪。都城迁走对当地人士的感情而言是一次很大的挫伤，多少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对此扼腕叹息，不胜唏嘘。

4. 水资源不足

历史上建都西安的朝代，充分依赖“八水绕长安”所形成的有利形势建造都城，尤其是隋唐长安城所利用的水源，主要来自秦岭山脉和地下潜水层。关中平原的天然降雨具有夏秋多于冬春季节的特点，山区降雨也多于平川台塬，年降雨量的年际变化也很明显，冬春降雨少会出现干旱现象，夏秋降雨多也会形成洪涝灾害。尽管如此，限于人口总量和城市性质，在1949年以前的长安或西安，有过饮用水水质不理想的记录，还没有出现城市建设中的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西安出现“水问题”应该说是从1949年开始的^⑧。当时从政治上考虑，政府要把西安从剥削阶级的消费性城市转化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生产性城市，1953年制定并经国家正式批准开始实施的《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东西郊详细规划》和《近期发展规划》等，目标是把西安建设成为“以轻型的精密机械制造和纺织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国家工业基地之一”。经过这样的规划和坚持不懈的发展，到1978年西安建城区面积达到131平方公里，城区和郊区总人口从1949年的227.33万增长到498.1万，至2000年其发展速度更为惊人，市区面积达到1964平方公里，人口达688万。与此相对应，从50年代开始出现的自来水供需矛盾，一方面是城市需水量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就是尽力扩大生产，挖掘潜力予以满足，呈现的是旺盛的供需指标不断突破原有规模的趋势，而解决水源的主要方式就是超采地下水一条途径。到80年代，西安城市生产和生活出现严重的“水荒”，

超采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导致大范围沉降区和城市地裂缝的出现，成为当时最棘手的市政问题。1996年开始的黑河引水工程为西安市区输水，通过工程手段引调客水进入西安，成为改善和及时解决西安供水不足问题的主要方式。但是近十年来，西安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经济新区不断建立，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安市常住人口进入新高（846.78万），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上了高速路，新一轮供水形势将更为严峻。

从历史到今天，西安都城史曾经独领风骚，西安城市史一再步履艰难，面对未来的动人憧憬，势必需要就地理环境对西安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做一番考量。

二、地理环境对西安的支撑作用

西安的地理位置牢固如磐，有人在论述西安南面的山脉时说，“秦岭山脉由西向东逶迤，在这里却向南拐了一个弯，这个弯度的伟大之处，是在秦岭北麓亮出了一个巨大的怀抱”^⑨，叙述极为有趣。从海拔2802米的牛背梁向远处望去，秦岭绕出的这个弯，正好是西安小盆地的展开地域。一个至为明显的事实是，唐末国都虽然向东迁走，五代的宋金时期的京兆府、元代的奉元路、明清时期的西安府，近代以来的西安市，仍然建在这里，说明历史上周秦汉隋唐诸王朝选建都址的地方具有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不仅是一个区域中心，还是区际之间的重要枢纽，可见选建之人无不目光睿智。

西安市的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在长期的人类生产等活动影响下，总的特点依然是温暖湿润，四季分明。西安的气候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也为西安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寒暖适宜，一向利于人类的生存居住^⑩。最关键的降雨情况，记录上虽有月际和年际间的变化，每年6-9月降雨集中、年降雨量维持在500-700毫米之间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2007-2009年年均降雨量为628毫米）。在西安的气候历史上，既有连续多年的干旱天气，也有降雨量超常增加的年份，如2011年9月1日至17日，西安市降雨量即达236.3毫米，是常年同期降雨量50毫米的4.7倍，被称为1961年以来之最。如此稳定或增大的降雨量，正是西安城市环境中最基本的生态保障。

西安的地形地貌及其土壤物理化学性状也比较稳定。南部秦岭山脉海拔一般在1500-2000米，北部关中平原一般海拔为400-600米，地质构造不

表 1 西安市 2007~2009 年月降雨量记录及其合计

(单位: 毫米)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2007	1.9	2.3	37.1	2.5	30.2	64.0	254.4	161.3	57.8	78.7	2.6	5.7	698.5
2008	19.1	7.5	21.7	55.6	22.0	59.8	83.7	87.3	83.1	73.1	12.3	0	525.2
2009	0	18.4	35.5	21.0	116.3	59.0	57.6	176.0	81.3	27.6	56.3	11.3	660.3

同,地貌景观互异,彼此界限清晰,形成良好的山地-平原间的气流和水热能量输送系统。西安小平原东西长为 140 公里,宽达 40 公里,自南而北依次为渭河河漫滩及渭河 1~3 级阶地,地势宽阔平坦,黄土物质覆盖深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不断开辟扩大的农田,长期施用农家肥形成的肥沃的耕作层,在现代各种农业技术的参与作用下,夏秋粮食产量一般保持在千斤以上。新征用和拓展的城镇及交通道路用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而且呈现出日益繁荣的都市景象。

西安城市的外在表象,依然是平坦的八百里秦川,冬夏较长的四季,如果就此认为西安的自然状况一直稳定,没有什么问题,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城市——“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对抗最为激烈的地点,作为‘天然的智人库’,作为威胁整个地球、最大量的污染的源头”^①,自然界各个要素及其总体面貌绝对不会平静。据《西安市的颗粒物污染控制》报告介绍,西安的空气质量除本身受到天气诸种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燃煤污染源、机动车污染源、城市逸散性粉尘源、城市垃圾颗粒物污染源、非燃煤工业源及远程自然粉尘来源的共同影响,可吸入颗粒物成为城市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②。因而,一年之内,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空气中多有悬浮的浮尘颗粒及有害气体,不是雨天雨水产生的裹挟作用的话,仰望西安天空终难见到蓝天白云的景象。

三、水: 维系西安城市生命的关键所在

2005 年初,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论证和修改,西安市人民政府形成了一份对西安城市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专题报告——《西安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发展报告》,全文虽不到 3 万字,但立意高远,意义重大。这份报告对西安城市发展的定位,归纳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的外向度,使之尽显其人文之都、科技之市、现代新城的魅力”这样生动的表述。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采用的题目是“关注城市发展路线图: 四化

西安将这样打造”,也是抓住了关键所在。

我们尤其关注报告中的“美好前景: 生态化”部分的阐述。报告拟定的生态化建设的目标为: 通过系统持久的建设,使西安生态环境逐步达到自然、清洁、安全、协调、舒适、优美;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大于 8 平方米; 河流水系污染得到普遍治理; 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普遍达标; 全市普遍采取节水措施,达到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60% 以上,工业废水基本全部达标排放,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0%; 城市空气质量到 2010 年好于或达到二级标准 282 天/年以上; 城市噪声达标区覆盖率达到 90%; 城市气化率达到 100%; 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大于 90%。

报告整理出来的西安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四大问题,其中前三个都同水资源有关: (1) 山地、台塬、丘陵植被破坏严重,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降低; (2) 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浪费并存。地下水开发利用过度,地表水开发利用不足; (3) 河流水系污染严重。西安境内有较大的河流 40 多条,其中中度至严重污染的超过总数的一半,地下水中度以上污染面积超过 200 平方公里。——我们认为这些分析也是点中了要害,抓住了关键。

那么,今日西安城市建设究竟缺水不缺水,如果缺水的话,究竟缺少到什么程度? 关于水资源统计的这一笔帐,计算和统筹起来的难度,很可能超过对任何其它稀缺或紧缺物品的统计。农业、工业各个行业建设需要水,市民生活需要水,房地产开发景观建造需要水,旅游业发展和世界园艺会举办也需要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上一直保留下来的泾灞、泾渭、沣渭汇合处,本来是西安周边的湿地所在,现在也逐渐纳入到各个经济新区的开发计划内了。一个是以河流形式存储的水资源,为西安的需要作为客水被引走,一个是河流岸边的平整土地,为不断扩大的西安城区一一囊括进来,西安周边河流生态的日趋恶化及西安城市向周边的大幅度扩张,均引起广大市民的焦虑和不安。总而言之,今日西安之大,已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作为国

都存在的周秦汉唐诸王朝的都城范围，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深度运作，已经将周秦汉唐诸王朝在西安小平原的所有都址用城市联结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了。

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的重要成果，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寻找一些确定性的原则。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举世闻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该项宣言申明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益处”^⑬。其中作为原则之一书写的条款是：“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在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⑭。

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诸多文件，第一份文件重申了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的精神，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思想，作为对以前有关环境问题认识的新观念。第三项原则的具体表述是：“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⑮；第八项原则的具体表述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且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⑯。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1992年的春天，一群科学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在海德堡的活动情况，他们面对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政治生态学者，在里约大会之前采用《致各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海德堡呼吁书》的形式，向联合国大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⑰，这种声音在维持人类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关系方面被认为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呼吁书》的最后一段文字集中地阐明了这些重要人士的看法，即“威胁我们的地球的最大问题是无知和压制，而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因为它们的手段是使人类能够由自己并为自己战胜人口过剩、饥饿和大流行病等灾难不可缺少的工具，只要这些手段得到恰当的运用”。学者们的思想已经阐发清楚，并在随即召开的里约文件中有明显的反映，问题是怎样做才叫做“这些手段得到恰当的运用”，这是具体实践中最难

的事情——特别是对利润或利益的追求脱离了科学知识界人士的期望的时候，许多忧虑、不满甚至指责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远在亚太地区的中国西安城市建设之实际，遇到的也多是这样棘手的问题。

到了本世纪初，有位率先提出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大概是受到他的同伴论著的启发，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著作中写入了《为人民重新设计城市》一章^⑱，在这一章的具体阐述中，他极力摒弃“以汽车为中心无计划延伸的城市”模型，提倡建立“城市铁路和自行车系统”，著作中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在论述如何“为人民计划城市”。——莱斯特·R·布朗阐述的“为人民计划城市”的思想，值得为大量“城市病”所困扰的人士来学习和体会。

举西安来说，如何获知广大市民的基本意愿，征求到最重要的意见或建议，是有利于规划近期和中远期城市蓝图的关键一着。再者，西安水资源不足已是基本事实，“大水大绿”的期望与这种事实之间的差距该如何协调和处理，有什么条件可以支持西安建设“山水城市”的说法，周秦汉唐和宋元明清哪个时期离我们最近，怎样缅怀前贤和敬仰历史王朝才更加符合实际，能否尽可能减少水面的汇聚，采用多养花养草种树培植绿地的方式，是不是更符合西安的自然条件和长久使命。

四、究竟谁可以决定西安城市的命运

论述至此，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即究竟是谁在决定西安城市的命运？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说理所应当应该是政府，这是具有许多道理和符合以往和现在诸多事实的认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要继续询问和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谁可以决定西安城市的命运？

一个城市的居民，从法律角度而言，都是国家的公民。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待，则有市政府管理人員和市民之分。所有居民同住一个城市，有关这所城市的市政条件、福利安排同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利益休戚相关。最为重要的是，涉及到基本生活条件的供水、供电、供气、道路建设等事项，无一不同资源环境要素紧密相连。我们处在一个居民总数在向千万大关靠近的时间段内，每一位市民自然拥有更多的理由关心和过问所居住城市的可持续居住问题。

在此，笔者非常愿意回顾一下1983-1985年西

安市政府领导的那次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和响应的西安环城建设活动，因为那次活动可以称为政府和人民情感交融的蜜月期。据最新研究，从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1781-1786）整修西安城墙后^①，又是一个二百年左右，又要大力修整破败不堪的西安城墙了^②。工程准备期间，就成立了省市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在开工典礼上，兼任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名誉主任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讲清楚了这一工程的修建方式和教育作用：

西安市委和市政府决定采取国家投资和多渠道筹集资金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分期实施相结合，专业队伍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我看是正确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依靠群众自己动手谋福利”，不仅可以节约国家投资，而且有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很好课程，对于锻炼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③

许多西安市民，包括在外地外国居住的有古城西安生活经历的人士，从新闻和报纸上获知将要修整西安城墙的消息，都无比激动，热情高涨，许多工作人员积极加入到义务劳动的行列中，不少市民也是自愿加入，出工出力，有的干部群众主动捐款，还有人写信为环城园林提出规划构想、提出修复城墙中应重视的抗震问题、桥坝结合问题、环城公路建设问题等。旅居美国科罗拉多的华裔人士龙英写信相告：“我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看到《人民日报》关于西安市人民动手兴修环城公园的报道，兴奋得不能入睡，当想到古城西安将围上绿色的‘项链’，清澈的河水流绕城周，游人能够在林荫中沿河堤散步，这怎能不使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④当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古城墙是西安的珍贵文物和重要标志，借助着还保留的时代激情参与其中，形成与政府倡导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号召极为难得的共鸣，完成了一项非历史上历次城墙修缮活动可比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城建维修工程。

时至今日，与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市民阶层，在城市文化的熔铸和熏陶中，已经日渐成熟，环境保护理念也更为深入人心，同过去相比，一句话，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更高了。事实上，“人民群众”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表达，在不少方面已经悄悄让位于更有法律和民主意味的“市民阶层”之表达。市民这一阶层包含着居民身上所有的社会性，包含着在同一城市生活居住的所有人，他们生

活中的种种意愿总会找到合适的诉求对象予以表达，这些对象可能是受到市民认可的某某报纸或某某团体，有时也会是某些市民自觉不能错过的机会。

许多西安人知道甚至不能忘记，这样的机会在西安公众媒体中已经出现并有过展露。2004年12月18日那一天，西安的天气是弥漫着浓密气溶胶颗粒的雾蒙蒙冬天景象，一名在“华商网”上开设“新西安论坛”的版主秦透社（网名），在西安的“华商网”等3家本地网站先后开展了“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这一评选活动给网民留出的时间真是不长，刚刚两周，到2005年1月1日这一天评选就揭晓了，其结果是“西安宝马彩票案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西安形象”等十条教训名列其中。这一结果不仅在广大网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部门。

据报道，评选活动发起后，立即引起了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视，无论是做出的批示还是在网上的回应，都充分肯定了评选活动的意义。对于评选结果，西安市方面很快召开了专题会议，对评选结果进行了研究讨论，要求相关部门和区县针对网民提出的问题，积极改进工作，寻找差距和不足，并在一周内提出整改措施，而西安公安局交管支队率先在“华商网”上回应“十大教训”，提出整改意见。最后，3月4日那一天，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约请参与评选活动的主要网名代表进行座谈，座谈的话题依然是那么直接而美好——即“西安咋样变得更美好？”

对于此次评选活动，舆论也给予了支持的声音。新年的1月4日，人民网“强国论坛”首页发布了网评，认为西安的评选活动是“2004年中国最有价值的一次‘十大’评选”。接着，《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十大教训评选，网民参政试验”。1月24日，《西安日报》发表题为《让教训成为推进发展的动力》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十大教训’对全市所有的部门和企业都是一次警醒。”网民就是市民，市民发表的意见就是民意，秦透社（网名）说“‘十大教训评选’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之所以得到政府部门肯定，其意义就在于民意的真实有效表达”，还有人评论说“现在是网民通过网络，以后可能是市民更为直接、广泛地参与，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一种必然。”

很明显，上述两个实例的实际意义各有不同，广大市民参与的西安环城建设活动，属于“人民城

市人民建”的事例，时隔 20 年后一部分市民以网民身份展开的“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属于“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事例，只是后者意欲参政的方式和途径都还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广度和高度。

我们认为，今日行使行政职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西安城市命运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正因为政府担负的职责重大和崇高，任重而道远，才需要一届届政府公职人员殚精竭力，服务市民，着眼长远，传好接力棒。为更好地调动广大市民当家做主、参与城市发展和管理的积极性，政府就必须广开合理渠道（如建立民意调查中心、赋予市民以相当的话语权、举行各种听证会、定期公布市政专项信息），与广大市民相沟通，广泛了解民意，努力形成以关心城市前途为中心的政府—市民新型关系，在全国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城市中做出表率。在这中间，充分展开磋商和论证工作，依据西安城市历史和环境特点形成自身特色，同广大市民一道共同为西安城市的可持续居住走出新路。

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支撑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史，相对而言，满足今天的需要和管理好今天的城市也是相对容易的。可是，我们不仅要考虑西安城市发展的今天，还要考虑到明天和将来，考虑到与世界上的雅典、罗马、开罗这些著名古都齐名的西安市史的长久延续。在中国，西安是数百个城市中一个很特别的代表，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地方，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一个市民认真地关爱她，保护她，也只有这样做，做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西安才会享有“长安”之福祉。

注释：

① 《汉书》卷 29 《食货志》。

② 可参考王培华《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③ [日] 洼添庆文：《魏晋南北朝时期の长安》，东洋文库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编《水经注疏注（渭水篇下）》，东京东洋文库发行 2011 年版，第 3-14 页。

④ 1994 年文物出版社第 2 版《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有一处排印之误，在第 136 页，内容为：

……

901 辛酉	四年
	天复元年
902 壬戌	二年
903 癸亥	三年
904 甲子	四年
905 乙丑	唐哀帝李祝 天祐元年
	二年

906 丙寅	三年
907 丁卯	四年

误处很明显在“905 乙丑”几个字排上一行，致使天祐二年无对应之纪年。史料方面有《旧唐书》卷 20 下《哀帝纪》文字：“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弑”（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785 页）。天复三年（903），其时辉王李祝受拜新职。次年为天复四年（904），时在八月十二日，昭宗被人杀害，身为昭宗第九子的李祝随即被立为皇太子，在灵柩旁即了皇帝位，第一个年号定为“天祐”，其元年也在 904 年同一年。又，万国鼎编、万斯年和陈梦家补订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 1979 年第 1 版），第 41 页列表唐昭宣帝（即唐哀帝）天祐元年在公元 904 年，也就是说，这一年与天复四年为同一年，其排版方式与 901 年唐昭宗时的光化四年、天复元年一样，要占两行。正确的排版方式为：

904 甲子	四年
	唐哀帝李祝 天祐元年
905 乙丑	二年
906 丙寅	三年
907 丁卯	四年

笔者使用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为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2001 年 10 月第 7 次印刷），有鉴于该书“出版说明”里有编者的一段话，即“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1973 年第一版，今经第二次修订，错误遗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落款为 1993 年 10 月），故在此特别予以指出，以便于使用。

⑤ 《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

⑥ [美] 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4 页。文中引文出自该书第 10 章，作者为罗伯特·萨默斯（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⑦ 《旧五代史》卷 150 《郡县志》。

⑧ 包茂宏：《建国后西安水问题的形成及其初步解决》，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59-276 页。

⑨ 陕西柞水牛背梁森林公园宣传片《牛背梁——秦岭国家森林公园》解说词，见陕西柞水牛背梁森林公园网站视频材料。如果说秦岭山脉在蓝田东侧向北伸出了骊山支脉，在蓝田西侧分布了白鹿、少陵、神禾诸原，形成了一个可供城市据以兴起的怀抱，当更为准确。

⑩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西安市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 页。

⑪ [法] 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16 页。

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编《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控制》第 4 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222-234 页。

⑬⑭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文件：《人类环境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 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附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8、157 页。

⑮⑯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 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附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30 页。

⑰ 这份由 425 位科学知识界人士签名的《致各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海德堡呼吁书》，形成于 1992 年 4 月 14 日，是写给当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全球高峰”会议）的，全文刊克洛德·阿莱格尔、陈亚东译《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45-146 页。

⑱ 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

济构想》，林自新、戢守志等译，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

⑲ 史红帅：《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考——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 年第 1 期。

⑳ 西安市城墙管理所、莲湖区“三整顿”办公室：《关于西安城墙被破坏情况的调查》（1980 年 7 月 25 日），刊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环城建设资料汇编》第 1 辑，1984 年，第 20-21 页。

㉑ 马文瑞：《群策群力，为把西安建设成美丽整洁的文明城市而奋斗》，《西安晚报》1983 年 4 月 1 日。

㉒ 《龙英的信》，刊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环城建设资料汇编》第 1 辑，1984 年，第 178 页。

作者简介：侯甬坚，男，1958 年生，陕西扶风人，理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62。

上海城市空间的成长

张晓虹

上海的崛起就像一个传奇，奇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深入了解上海的生命发展史，本刊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晓虹教授做了专访。

《江汉论坛》（以下简称江）：人们在讨论上海城市史时，常常会使用“从小渔村到大都市”这样一个极具反差的对比。但在这个形象化的对比中，上海变得好像是从零基础拔地而起，突然从一片渔村中杀出来的一个近代都市。在您看来，上海的城市生命史应该从何时开始算起？

张晓虹（以下简称张）：在“从小渔村到大都市”的说法里，包含着两个互为关联的内在逻辑：一是它表明人们很容易认为，上海城市的发展是直接导因于开埠这一历史事件，意即上海的诞生全仗于开埠；二是认为与其它对外通商口岸相比，上海开埠时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都较低，因此上海城市发展带有更强烈的戏剧性。后者较符合历史实际。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夸张，但显然是过分了。

上海的建城，学术界一般定在 1291 年，也就是元至元二十八年上海正式设县。^①不过即使这一事件，也只应看作上海作为已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正

式现身历史舞台。而在这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上海城市的漫长孕育过程早已开始。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传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在两宋时代完成了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转移，明清以后更是势倾东南。长江三角洲暨太湖流域凭借其优越的水热条件和发达的商业文化，日益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位于长三角东部的华亭/松江则是其中的翘楚，并最终导致了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

唐宋时期今属上海直辖市的绝大部分地区虽都已成陆^②，但除西部地势稍高外，东部大都为港汉纵横的滨海低地。从太湖渲泄而出的水流汇集成“深广可敌千浦”的吴淞江，东流入海，成为苏州地区主要的对外贸易运输线。这一时段吴淞江的入海口位于当时华亭县（今属上海西部青浦区）境内。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吴淞江南岸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商港——青龙港。成书于南宋的绍熙《云间志》曰：“青龙镇去（华亭）县五十里，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青龙港的存在带动了华亭县城的兴盛繁华，宋人描述它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蕃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堪为东南第一大